

100 年度哲學學門赴德國考察計畫報告

「東西跨文化研究」跨領域學術交流及前瞻議題之合作規劃

出國計畫召集人：鄧育仁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國科會哲學學門召集人

何乏筆 (Fabian Heubel)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

李明輝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林鎮國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特聘教授、宗教研究所合聘教授

孫效智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兼生命教育研發育成中心主任

馬愷之 (Kai Marchal)
東吳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蔡彥仁
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教授

龔卓軍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副教授

魏念怡
國科會人文處研究員、哲學學門承辦人

彙整：林鎮國教授

壹、參訪理念與目標

「跨文化哲學」(transcultural philosophy) 是一新興的研究領域，其目的並非是檢視「自我」與「他者」間的異同，而是著重在文化流動、交會與轉化的動

態過程。就現代的歷史情境而言，對於西方知識（特別是西方哲學）的接受與轉化，無論有意或無意，一直是漢語哲學的主要部分，所以漢語哲學以文化間際（intercultural）或跨文化的方式來思考或研究，業已超過百年。儘管在當代漢語哲學的領域中，歐洲與非歐洲之間已有持續的動態交流，然而歐洲學界並不瞭解東西文化與哲學資源的跨文化交流所具有的創造性潛能，因此其中應該有許多推動新交流與新合作的契機。

在台灣相當獨特的歷史與文化情境中，跨文化是一敏感、審慎的議題。因為我們無法定義一明確且穩定的「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所以如何將不同語言與文化資產的複雜互動，當作是文化創造性的資源，成為無可忽視的生存問題。這個獨特的歷史與文化脈絡也反映出台灣哲學研究的特性。在漢語成為學術工作的主要語言的情境中，諸如當代儒學、佛學、倫理學、分析哲學、政治哲學、美學、批判理論等等研究領域的許多學者，都逐漸認識到這個情境所特有的跨文化潛力，並以此作為探究的起點，中國、日本與西方資源在這些研究中有了創造性的互動。

在不同的學術研究領域裡，跨文化研究逐漸取得全球的重要性，我們深深地相信，台灣的哲學與宗教資源能在跨文化研究領域中提供引人入勝且深具學術價值的研究觀點與視野。因此，我們希望藉此參訪行程向德國學界，引介台灣哲學研究現有的成果與未來發展潛力，也希望從德國學者中獲得一些洞見並擴展我們的學術視野，同時建立起雙方未來的合作關係。

貳、參訪行程與人員

一、參訪行程

2011年7月4日海德堡大學（Universität Heidelberg）

2011年7月5-6日希爾德斯海姆大學（Universität Hildesheim）

2011年7月7日漢堡大學（Universität Hamburg）

2011年7月8日波鴻魯爾大學（Ruhr-Universität Bochum）

2011年7月11日慕尼黑大學（Ludwig-Maximilians Universität）

2011年7月12日法蘭克福大學（Universität Frankfurt）

二、參訪人員（依姓名筆畫順序）

何乏筆（Fabian Heubel）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兼

任副教授

李明輝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合聘教授、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合聘教授

林鎮國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特聘教授、宗教研究所合聘教授，國科會哲學學門召集人

孫效智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兼生命教育研發育成中心主任

馬愷之 (Kai Marchal)

東吳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蔡彥仁

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教授

鄧育仁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處長 (時任國科會哲學學門召集人)

龔卓軍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副教授

魏念怡

國科會人文處研究員、哲學學門承辦人

參、各場研討報告

一、2011年7月4日海德堡大學 (Universität Heidelberg)

這次的德國學術參訪行程第一站是海德堡大學。我們事先和海德堡大學「全球脈絡的亞洲與歐洲卓越研究群」(Cluster of Excellence “Asia and Europe in a Global Context”) 聯繫，定於7月4日下午2-5時，假雅斯培高等跨文化研究中心 (Karl Jaspers Centre for Advanced Transcultural Studies) 舉行一場以「跨文化視野中的哲學與知識史」(Philosophy and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in Transcultural Perspective) 為題的研討會。

海德堡大學「全球脈絡的亞洲與歐洲卓越研究群」是由德國研究基金會（DFG）和德國科學與人文委員會（German Council of Science and Humanities）所支持的大型研究計畫，下分四大領域：治理與行政、公共領域、健康與環境、歷史性與傳承，各領域再分為十數項子計畫不等。接待我們參訪團的顧有信（Joachim Kurtz）教授即主持其中的「晚期帝制中國的論證」研究計畫。顧教授即將出版《中國邏輯的發現》（*The Discovery of Chinese Logic*, Brill, 2011），探討從明末耶穌會士到清末嚴復等人對於西方邏輯的引進。另外一位專攻佛教知識論的 Birgit Kellner 教授也參加研討會，她研究法稱（Dharmakīrti）之後的量論，在國際學界頗受矚目。我們這次的研討主題，便是以二位東道主的專長來設定。

研討會開始，由顧有信和林鎮國教授介紹雙方學者認識，接著由顧有信教授發表「為何是跨文化概念史？」（What (Good) is a Transcultural History of Concepts?），強調跨文化理論主張文化不是實體（entity），而是一種流動的過程（flow）。在方法論上，這種觀點導致研究重點不在於「比較」不同「國家」的文化，而是在於抉發這些文化體中原本就有的異文化的流動性因素。就概念的跨文化流動而言，他特別強調二種研究進路必須兼顧：一是縱向的發生學進路，另是橫向的生態學進路。接著之後由林鎮國報告「中古中國如何理解佛教知識論：一種跨文化的探討」。該報告分為二部分，首先報告他所主持的佛教知識論計畫的大體情況，接著報告其個人的研究主題：以淨影慧遠（523-592）和慧沼（648-714）為主的量論，指出六至七世紀的漢傳佛教知識論如何不同於印度的原貌。

第三位報告人是 Birgit Kellner 教授，她談論的問題是：「全球的理性與真理的歷史：探究跨文化視野下的辯論活動」。由於 Kellner 的訓練是語言文獻學，她強調針對研究對象的客觀性研究。這實證的方法論態度後來和何乏筆教授有所爭論，成為本次交流很有意義的一章。第四位報告人是何乏筆教授，講題是「當代漢語哲學的跨文化意義」。正好和 Kellner 的實證主義立場相反，何乏筆一貫地從批判理論和傅柯（Michel Foucault）的立場出發，強調漢語哲學在台灣所體現的政治與文化危機，必須以實踐的態度介入哲學的活動。二人的方法論態度的相左，反映了二人所處的生存位置的不同，而這問題正是需要溝通與瞭解之處。這同時也是活生生的跨文化交流的問題，雖然無法一時獲得彼此的共識。

接下來的報告是 David Mervart，他談「比較思想史還有何可為？在政治思想史的同異之外」，重點在討論日本德川時代作為社會的道德基礎的「風俗」以及商業社會興起後的諸問題。最後壓軸是鄧育仁教授，報告「在科學與民主交會處的儒家」，以實踐觀點下最小方案的立論取徑，來說明當事人的選擇自由及其涉入的因果性。以此立論方式入手，顯示出當事人選擇自由的實踐觀點，與適合

於揭露因果秩序的理論觀點，不是分別獨立，而是相即連動而展開的觀點。

整場研討活動十分熱烈，以致於超出預定的時間，可說是欲罷不能。特別值得一提的是，Rudolf Wagner 教授，海德堡大學頗負盛名的漢學家、該校卓越計畫的共同主持人，也出席討論，為本次研討增色不少。

二、2011 年 7 月 5-6 日希爾德斯海姆大學（Universität Hildesheim）

參訪行程第二站為希爾德斯海姆大學哲學系，5 日下午 3-6 點進行會面與詳談的交流活動，希爾德斯海姆大學副校長 Thomas Lange 教授、文化研究院院長 Tilman Borsche 教授親自參與，並由哲學系教授 Rolf Elberfeld 主持。希爾德斯海姆大學哲學系幾年前開始轉向，決定以哲學、藝術和跨文化研究的關係作為教學和研究特色。因此，在參訪的事前規劃中，早已計畫將要促進希爾德斯海姆大學哲學系與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之間的合作關係（目前已進一步開始規劃 2012 年交流活動）。

在第一天下午的討論過程中，除了哲學與藝術的關係外，已談及這類的交流對學院哲學的制度將會產生若干衝擊及轉化作用。Elberfeld 教授特別提到，在全球化的情況下，哲學應該從語言的多元性出發，從學習與自己母語不同語系的語言開始，打開跨文化的反思空間，促使跨文化哲學的發展。他強調，希爾德斯海姆大學哲學系將要透過哲學、藝術和跨文化研究，開闢哲學概念的新視野，突破德國哲學的歐洲中心傾向。他表示，他很有意願加強與台灣哲學界的合作關係，進行具有思想願景的長遠合作。

第二天，7 月 6 日，早上九點三十分到下午五點，舉行了「跨文化哲學與美學」(Transcultural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 工作坊，依序由龔卓軍教授發表「謝德慶的生命作品」(The Lifeworks of Tehching Hsieh)、Lisa Bauer「在適應與自我異國情調化之間的當代台灣藝術家」(Zeitgenössische Taiwanische Künstler zwischen Anpassung und Selbstexotisierung)、何乏筆博士「當代平淡繪畫：台灣與中國的例子」(Zeitgenössische Malerei der Fadheit – Beispiele aus Taiwan und der VR China)、Rolf Elberfeld 教授「哲學與東亞書法」(Philosophie und ostasiatische Schreibkunst)、鄧育仁博士「排列作為一種言說策略」Alignment as a discourse strategy) 和 Henrik Jäger 教授「《四書》的第一個拉丁譯本及其對沃爾夫之影響」(Die erste lateinische Übersetzung der “Vier Bücher” und ihre Rezeption bei Christian Wolff)，進行一整天的論文發表與熱烈討論。訪問團並於中午休息時間，與該校校長 Wolfgang-Uwe Friedrich 教授會面，並在會面中初步確立，希爾德斯海姆大學與台南藝術大學將正式建立合作關係。

訪問團在希爾德斯海姆大學哲學系的重要收穫之一，在於思考哲學與生活實踐之間的緊密關係。希爾德斯海姆大學哲學系所開闢的新方向，不僅串連哲學與藝術，也特別凸顯東亞哲學在當今哲學全球化脈絡中的關鍵意義。Elberfeld 教授具有日本哲學，尤其是京都學派研究的背景，目前在德國哲學界是首位具有跨文化哲學訓練的哲學教授，對哲學作為生活方式和修養實踐特別感興趣。希爾德斯海姆大學哲學系的情形讓我們思考到，哲學在當今學院脈絡下的制度問題，並且讓我們反省，哲學除了目前全球化的製作論文的量化方向以外，是否還有其他發展的可能。進一步來說，我們思考到，在跨文化哲學的脈絡中，能否透過德國與台灣的合作，展開新的哲學概念，以及哲學課程的另類模式（即一種跨校、跨國的跨文化哲學課程），以充分發揮台灣跨文化哲學的潛能。換言之，除了哲學、藝術與跨文化研究的緊密關係之外，訪問希爾德斯海姆大學哲學系另一啟發在於，理解德國哲學界如何對於「何謂哲學？」不斷地進行反思，試圖在當今大學制度的處境下，實驗性地提出創造另類哲學的可能。

三、2011 年 7 月 7 日漢堡大學（Universität Hamburg）

參訪團於 7 月 7 日早上由希爾德斯海姆出發，約在中午時分抵達漢堡。漢堡大學的 Sarah Kirchberger 教授到火車站迎接並引領我們至大學校園。台灣駐德國代表處漢堡辦事處張曉妮處長亦前來，招待我們及德方教授午餐，席間大家就漢堡大學的哲學、宗教、漢學以及整體人文學術發展走向，交換意見。圓桌討論會為配合另外一位 Kai Vogelsang 教授之時程，活動安排在下午四時開始。

討論會主題為「民主與中國文化：民國百年之哲學反思」（Democracy and Chinese Culture: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the Centena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適逢民國百年，以此進行歷史回顧與哲學反思。會議參與人員約有二十多位，除了學界人士之外，還包括幾位台灣旅德僑胞與對台灣人文與民主政治發展感興趣的德籍友人。首先由 Vogelsang 教授發表論文，主題是「追尋社會之政治：中國的革命」（Nach der Politik die Gesellschaft: Revolution in China），他主要探討二十世紀初，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微與轉折，特別針對彼時幾位關鍵人物，例如梁啟超、譚嗣同等人所提倡的新思想，如何援引日本和西方先進國家的民主觀念與制度，介紹今天耳熟能詳的諸如民族、人權、尊嚴、平等、合作等新名詞給國人，期使中國在劇變的時代邁向坦途。Vogelsang 在短短二十分鐘的報告中，描繪出中華民國肇基期的歷史背景與思潮脈絡，為討論會做好了鋪敘的工作。Kirchberger 教授緊接著報告「二次革命：1980 年代的台灣」（Die zweite Revolution: Taiwan in den 1980ern），她認為台灣在 1980 年代的轉變，可視為中華民國第二次革命，而彼時總統蔣經國即是發起者與執行者。就人格特質而論，蔣經國能力

強但對其敵對者毫不留情，他的列寧式鐵腕作風屬於「開明的威權領導」(enlightened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在台灣由訓政走向憲政的過渡期，恰好發揮正面的作用。至於蔣氏個人如何願意在其晚年，一改威權作風，精心安排接班人，安渡至民主政體，Kirchberger 承認並無政治學理論可做適切的解釋。

繼之由馬愷之教授發表「什麼才是儒家民主：民國百年的幾點看法」(Was eine konfuzianische Demokratie sein kann: Anmerkungen zur 100 Jahre Republik China)，他的重點在探討儒家與現代化或現代性的關係，思考百年來，這個中國的主流思想傳統如何與民主體制結合，在新時代開展新方向。蔡彥仁教授討論的主題是「民主化台灣的宗教與宗教研究」(Religion and the Study of Religion in Democratized Taiwan)，他根據最近分析的實證資料，報告自 1987 年解嚴後，台灣社會各宗教團體和宗教活動勃興的盛況，以及在此風潮下，不少大學相繼設立宗教系、所，更多學者亦投入宗教的學術研究。但是不可諱言，此一急遽的發展也為宗教學界埋下隱憂，例如宗教研究未有明確界圍，參與者未必熟悉其內涵與方法，導致缺乏共識下基礎薄弱。蔡教授提議台灣的宗教研究，一方面應建立其學術專業主體(academic discipline)，另一方面，亦應維持其開放與多元的特色，即形成一學門領域(field of study)，在兩方辯證的互動關係下，或可見其新發展。最後，林鎮國教授發表「戰後台灣的佛教與民主」(Buddhism and Democracy in Post-war Taiwan)，主要討論戰後台灣佛教與政治的關係，並藉此思考是否在佛教或佛學內部，存有民主和現代化或現代性的元素。林教授援引社會科學學者如瞿海源與郭承天的研究，發現台灣的佛教團體在政治關係與社會議題上，呈現保守與妥協的態度。如此觀之，佛教對於民主化和民主政體是否無緣？他闡釋佛教有「勝義諦」與「世俗諦」二法，前者指涉終極真理(ultimate truth)，目的在追求最後的涅槃解脫，而後者則是方便法門(conventional truth)，屬於今世當下的識見。林教授歸結強調，此二諦其實依存互生，台灣的人間佛教發展，即見證終極解脫如何在現代社會實現，而人間淨土的追求，也可與啓蒙思想所揭櫫的正義、平等、自由等普遍價值調和並立，因此佛法可以和台灣的民主化結合殆無疑義。

整體而言，漢堡大學的討論會時間雖短但議程緊湊，有意猶未盡之憾。再者，該校參與的幾位教授係漢學背景，專主歷史而非哲學或宗教，對比我方成員，在研究議題和學術興趣上稍有差距，然衡諸本參訪之跨科際、跨文化研究之目的，以及漢堡大學在北德的重要性及其在歐洲的漢學研究地位，我們此行仍有建立學術關係與拓展未來合作的意義與價值。

四、2011 年 7 月 8 日波鴻魯爾大學 (Ruhr-Universität Bochum)

波鴻魯爾大學是參訪行程的第四站，一行人於 7 月 7 日晚上從漢堡搭火車前

往波鴻，次日進行一整天的研討會，主題為「以跨文化觀點論內在性與超越性」(Trans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Immanence and Transcendence)。接待單位是該校的人文學研究國際學院(Internationales Kolleg für Geisteswissenschaftliche Forschung)，此一學院係爲了執行由德國聯邦教育與研究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資助的大型研究計畫「宗教史中的動力」(Dynamics in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而設。該計畫的總主持人爲宗教學兼社會學教授 Volkhard Krech，執行期間爲六年(2008 至 2016 年)，大約相當於我國的「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計畫」，其主要目的是從跨文化的角度探討歐洲與亞洲宗教的關係(相關資訊見網站<http://ikgf-religions.de/>)。由於本訪問團的成員李明輝教授曾於 2009 年 9 月至 2010 年 2 月期間參與該研究計畫，與該計畫成員已建立起密切的合作關係，故該學院極爲重視我們的訪問，將我們的研討會列爲其研究計畫的項目。除了總主持人 Krech 親自出面並發表論文之外，該校亞洲學系教授兼分項計畫主持人 Heiner Roetz 亦全程參與及主持研討會。

研討會由 Roetz 教授開場，Roetz 本身雖是漢學家，但他在法蘭克福大學取得博士學位，深受法蘭克福學派的影響，因此哲學背景極爲堅實。他先介紹其研究團隊，然後對於黑格爾以來西方學者認爲中國思想欠缺超越性的觀點，以及韋伯(Max Weber)將中國未發展出資本主義的原因，歸結於此的論點等，從哲學的角度予以檢討。Roetz 認爲，當代新儒家的「內在超越」說對此一成見提出了有意義的挑戰，也爲現代的宗教學研究打開了新的視角。接著由李明輝教授報告「儒家的內在超越性」(Immanent Transcendence in Confucianism)，他介紹當代新儒家之所以提出「內在超越」說的思想背景及理據，並分析當代新儒家對於儒家與宗教的兩種看法，即視宗教性爲儒家思想的本質因素(牟宗三、唐君毅)，以及視宗教性爲儒家思想的歷史殘餘(徐復觀)。

Krech 教授在他的報告「作爲神聖化的內在超越性」(Immanent Transcendence as Sacralization)中，除了討論「內在性」與「超越性」兩個概念之外，還加入了一個「神聖化」(Sacralization)的概念。他從宗教社會學的角度，根據這三個概念提出一套極爲複雜的類型學劃分。林鎮國教授在其報告「空性與暴力：龍樹與德希達不期而遇的交談」(Emptiness and Violence: An Unexpected Dialogue between Nāgārjuna and Derrida)中，從德希達〈暴力與形上學〉一文中對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的解讀切入，將佛教哲學家龍樹關於「空性」的觀點帶入與這兩位歐洲哲學家的對話中，比較他們三人關於暴力議題的相似觀點。Gesche Linde 教授在其報告「內在性、超越性與再現：韋伯關於西方宗教的觀點是否正確？」(Immanence, Transcendence, and Representation: Was Max Weber right about “occidental” religion?)中則檢討韋伯宗教社會學中有關「內在性」與「超越性」的論述。

何乏筆教授之論題為「不是宗教的超越性？中國哲學之歐洲詮釋中的內在性概念」(Transcendence without Religion? On the Notion of Immanence in European Interpretations of Chinese Philosophy)，他檢討當代西方漢學家(Heiner Roetz, François Jullien, Jaen François Billeter)對於「內在性」與「超越性」的不同看法，並且將此問題關聯到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對康德形上學的批判，以凸顯「內在超越」說的現代意義。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郭沂教授目前在科隆(Köln)訪問，順道來參加此一研討會，在其報告「早期儒家的內在與外在超越性」(Inner and Outer Transcendence in Early Confucianism)中，分析中國儒學史中有關「內在超越性」與「外在超越性」的論述。Otto Kallscheuer 教授的報告「主體性與超越性」(Subjectivity and Transcendence)則闡述「超越性」概念在西方的起源與發展，以及它與「主體性」的關係，也談到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與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的相關看法。

會後，延續熱絡的討論氣氛，波鴻大學設宴邀請所有與會學者餐敘與交流。次日適逢周末，前國科會駐德科技組胡昌智組長在家裡宴請國內學者及部分德國學者如 Heiner Roetz、Henning Kloeter、Jörn Rüsen 等，在餐宴中雙方學者繼續進行非正式的思想交流。

五、2011年7月11日慕尼黑大學(Ludwig-Maximilians Universität)

本日在慕尼黑大學有二場活動，早上先與「慕尼黑跨科際倫理研究中心」(Münchner Kompetenz Zentrum Ethik, 縮寫 MKE)舉行一場交流座談會，下午則於漢學系舉行「儒家與文化間際哲學」(Confucianism and Intercultural Philosophy)研討會。

MKE 是慕尼黑大學於 2005 年創立的跨院系倫理研究中心，其宗旨在於結合哲學、神學、醫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生物學與法學等不同專長領域，建立一跨科際之平台，共同來探索當代愈形複雜的各種倫理問題。此外，該中心也尋求國際合作，期促進重大倫理議題的跨科際與跨文化研究，目前的執行長為 Stephan Sellmaier 教授。由於台大在 2008 年也創立了一個性質類似的「臺大生命教育研發育成中心」，中心的任務除了教育推廣外，學術方面則致力於各種重大生命課題(不局限於倫理問題)之跨科際研究。所以此次參訪計畫安排兩中心的交流，希望能為未來的合作研究或對話機會投石問路。

上午安排了兩個小時的交流座談會，首先由孫效智教授介紹「臺大生命教育研發育成中心」的宗旨、生命教育所關懷的三大根本人生課題、五大行動領域、現況與願景，次由 Sellmaier 介紹 MKE 的宗旨與現況。MKE 負責慕尼黑大學在

倫理方面的課程，未來打算開設應用倫理學之碩士學程。目前的任務有四，其一、為一般大眾舉辦各種倫理議題之演講系列與論壇；其次、支持並促成跨科際倫理問題之學術研究計畫；其三、針對各專業領域組織專業倫理之工作小組，例如醫學倫理工作小組；最後，該中心也接受國家或其他單位委託，處理各種倫理衝突之專業研究與評估。

雙方報告後有豐富的對話與交談，特別是針對未來合作的可能議題與方式進行了意見交換。雙方都肯定，在進行學生交流之前應先進行教授團隊的交流，亦即在特定倫理議題或生命課題上進行國際合作學術研究計畫。由於雙方的學術研究均具相當程度的跨科際性，彼此若能在未來合作將更增添相關研究的跨文化性。因此，雙方均表達高度的興趣與期待，預定未來合作的方向與時程如下：方向上可以先針對圍繞著死亡的各種倫理議題進行交流，例如安寧療護、死亡定義、死亡時點之確定、死後器官捐贈與移植等問題，進行的方式可以是先確定具體的合作研究議題與參與之跨科際成員，來進行跨文化與跨科際之合作研究。時程方面則預定明年九月進行合作研究之論文發表國際會議。

下午在慕尼黑大學漢學系進行「儒家與文化間際哲學」研討會，時間從下午兩點到五點半，與會者除了我方八人，還有兩位代表漢學系的學者，Hans van Ess 教授與 Christian Soffel 博士，以及來自慕尼黑哲學大學（Hochschule für Philosophie）的 Andreas Trampota 博士。與會者共約有二十餘人，氣氛相當專業，討論十分活絡。

第一位發表人是李明輝教授，主題為「德性倫理學、康德與儒家」（Virtue Ethics, Kant, and Confucianism），他對於美國近年來將儒家定位為德性倫理學的學者做了強烈的批評，並詳細說明為何最接近儒學的是康德義務論，而非德性倫理學。第二位發表人是何乏筆教授，討論「當代儒家、批判理論與跨文化之修養理論觀點」（Contemporary Confucianism,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Perspectives of a Transcultural Theory of Cultivation），透過對傅柯、康德以及牟宗三的分析試圖說明中國工夫論在跨文化視野中的可能理論意義。其演講的重點之一，乃是傅柯與牟宗三對於康德的不同繼承與轉化，傅柯欲解構康德哲學中獨立且自律的主體（autonomous subject），將基督教超越性從當代歐陸哲學排除，為此，傅柯將對有限性的批判與越界（transgression）的美學聯結起來，不過最終無法避免虛無主義，缺乏明確的倫理意義。而牟宗三則試圖超越康德，避開後康德哲學所帶來的虛無主義，重新開展形上學的視角，也重新肯定儒家的倫理意涵。

前兩位發表人引起許多討論，兩份報告可說是從兩種不同的角度來說明新儒家的見解。第三位發表人是 Christian Soffel 博士，他所處理的題目為「錢穆的政治哲學」（Qian Mus politische Philosophie），Soffel 還原了錢穆撰寫《國史大綱》、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等著作的寫作動機，並說明錢氏對中國政治的理想藍圖與制度安排，最終也試圖解釋其政治思想為何至今仍影響中國大陸輿論與學界。馬愷之教授在其報告「新儒家之倫理學面向」(Ethische Perspektiven im Neukonfuzianismus)中，試圖說明宋明理學對於當代倫理思維的可能貢獻，特別著重朱熹、王陽明等哲學家對於道德情感的重視以及對道德意識的陶冶(工夫)的若干理論。另外，馬愷之也概略說明了宋明理學與康德哲學的不同之處，他認為宋明理學所追尋的是一種「前反思視野」(pre-reflective horizon)，一種孟子齊宣王舍牛等故事所描述的道德反應的「直接性」(Unmittelbarkeit)，與近代西方倫理思維雖然有某些共同之處，但亦有一定的差距，可為當代倫理思維提供另一種觀點。

最後，Andreas Trampota 博士討論「從文化間際之德性倫理觀點來談規範與價值」(Norms and Values from an Intercultural Virtue Ethical Perspective)，Trampota 在此試圖說明德性倫理學對於跨文化問題的可能貢獻，若順著 Martha C. Nussbaum 的看法，將德性理解為人類共同經驗的不同角度，德性倫理學確實可以對跨文化哲學作貢獻，對於德性的反思可以使得我們重新思考「規範」與「價值」的區別。本活動於五點半順利閉幕，但許多討論到晚宴時仍繼續進行。整體而言，此活動相當成功，跨越了漢學系與哲學系這兩種不同的領域。德國哲學系一向漠視中國哲學，而德國漢學系往往忽略哲學，要打破此一僵局十分困難，但此活動不僅說明了儒家傳統的潛在哲學性、燃起了學者與學生的熱情，或許也將成為未來合作的基礎。

六、2011年7月12日法蘭克福大學 (Universität Frankfurt)

此次緊湊參訪行程的最後一場研討會，是在法蘭克福大學舉辦「批判、規範性與當代儒學：跨文化視野」(Kritik, Normativität und zeitgenössischer Konfuzianismus: transkulturelle Perspektiven) 圓桌討論會，會議由法蘭克福大學哲學系系主任 Christoph Menke 教授及漢學系 Iwo Amelung 教授共同籌辦，由 Menke 教授主持，台、德雙方共計八位發表人。

會議首先由 Menke 發表「權利與普遍性」(Rechte und Universalisierung)，強調思考人權的普遍性時，不應該忽略人權乃是社會政治鬥爭的產物。Amelung 的講題為「批判理論的理論旅行」(Critical Theory as Travelling Theory)，先介紹法蘭克福大學漢學系的發展，進而討論法蘭克福學派在中國的接受史。Achim Vesper 博士討論「規範性概念」(Konzeptionen der Normativität)，介紹「規範秩序之形成」卓越研究群有關規範性概念的意涵，並分析規範性與證成 (Rechtfertigung) 的緊密關係。Martin Saar 博士探究「何謂批判？」(What is

Critique?)，區分批判概念的三種向度：建構的批判 (konstruktive Kritik)、重構的批判 (rekonstruktive Kritik) 與解構的批判 (dekonstruktive Kritik)，並指出三種批判的奠基者依序為康德、黑格爾與尼采。何乏筆報告「批判理論與當代儒家」(Critical Theory and Contemporary Confucianism: Remarks on a Transcultural Constellation)，從批判性修養論的跨文化向度著手，凸顯規訓、工夫與法蘭克福學派最新思想發展的聯接點。

馬愷之「德性、道德律與存有實踐：新儒家在跨文化現代性中的重要意義」(Tugend, Moralgesetz, existenzielle Praxis: Zur Bedeutung des Neukonfuzianismus in einer transkulturellen Moderne)，強調新儒家對跨文化現代性之研究的重要性，特別指出德性倫理與當代新儒家之間的發展潛力。蔡彥仁主題為「儒家心學：宗教史觀點的反思」(Confucian Heart-and-Mind: A Refle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討論當代新儒家與宗教的關係，他認為當代新儒家與某些本質主義的宗教學者比較容易展開對話。孫效智發表主題為「當康德與死後捐贈器官規則相遇」(Wie universal können moralische Regeln sein? Das Beispiel der Tote-Spender-Regel)，死後捐贈器官規則 (Dead Donor Rule, DDR) 是當代器官移植倫理最為重要的倫理規則之一，因為它代表著「不可殺人」這條重要的道德規則在移植領域的一個具體的道德底線。然而，隨著生物醫學在維生與器官移植科技方面之進步，DDR 成了一個爭議性的規則：究竟人們應該將之無限上綱？抑或應該因時制宜地知所權變？該報告簡單說明了這個問題的背景，並引出康德的觀點來思考這個當代移植倫理的課題。

所有主題發表完畢後，再進行近一小時的討論。在討論過程中，提及法蘭克福大學所進行的「規範秩序之形成」卓越計畫的跨科際方向與早期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對跨科際研究的觀點之間的關係。Menke 與 Saar 指出，其實目前對跨科際合作的要求首先來自聯邦政府的科學發展規劃及相關的審查制度，與法蘭克福學派的跨科際研究理念沒有直接的關係。然而，在進行「規範秩序之形成」大型計畫的過程中，參與學者的確也發現跨科際合作的優點。同時，法蘭克福大學的卓越計畫與其他參訪地點的大型計畫明顯不同之處在於缺乏跨文化研究的向度。除了聘任一位負責後殖民主義潮流的教授之外，此計畫其實建立在康德式的普遍主義觀點之上，而此觀點顯然不強調對非西方文化或哲學進一步理解的必要。不過，法蘭克福大學的學者都承認，此一領域的確有待發展。

此議題牽涉到批判概念的界定和範圍。承上述 Saar 所討論的批判概念的三種向度，在歐洲批判理論的發展中，不同的學者著重不同的向度，例如在當代屬於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者中，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 接近康德模式、霍耐特(Axel Honneth)接近黑格爾模式，而 Menke 與 Saar 則偏向尼采模式。這三種批判思想的資源對當代批判理論的發展而言，都具有正當的功能，而不應該互相排

斥，但是 Saar 認為，就批判理論與跨文化研究的連接來說，「解構的批判」的重要性特別顯著，因為在解構批判的範圍內，歐洲普遍主義的反省和質疑有助於產生對非歐洲文化和哲學資源的開放態度。因此，在三種批判模式的比較下，尼采模式將最有助於推動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的跨文化轉化。

肆、結論與建議

一、跨文化研究與跨領域、跨科際研究的關係

這一次參訪重要的啟發之一是牽涉到跨文化研究與跨領域研究之間的緊密關係。從每一站參訪的大學單位可知，德國政府所支持的大型計畫，必須以建立跨領域合作網絡為基礎。大型的計畫若無法展開跨領域合作，就無法通過申請。除了跨領域研究的要求外，跨文化研究的傾向也是大型計畫的特點。無論是海德堡大學「全球脈絡的亞洲與歐洲卓越研究群」或波鴻大學「宗教史中的動態交流」計畫，都展現出此一方向；西爾德斯海姆哲學系以串連哲學、藝術和跨文化視野的方式，也選擇了相似的取徑來凸顯自己在德國哲學界的特點。法蘭克福大學的卓越研究群「規範秩序的形成」也著重跨領域的合作網絡，但跨文化研究的傾向仍然薄弱些（參與圓桌討論的相關學者承認在這方面的確有加強的必要）。從這些計畫也能了解到：跨領域研究成敗的基本要件，乃在於能否提出具有引導性和凝聚力的共同問題及開創性的研究主題。因此，若考慮將來在台灣推動跨文化研究及跨文化哲學方面的計畫，則必須考量如何從一開始便展開跨文化與跨領域的格局。

二、跨文化哲學在台灣潛力

在目前台灣學科分類的情況下，進行跨領域研究極為困難，而且這方面的計畫將會面對各個學科（或學門）的強烈質疑。因此，在人文社會科學的不同領域中，必須建立相應的合作網絡，並發揮制度上的想像力和創造力。就跨文化哲學的領域而言，有意願推動跨文化哲學研究和教學的學者能彼此相互串連、合作，乃是基本的發展步驟。除了舉辦工作坊、研討會或研習營（研究營）外，應該要思考跨文化哲學如何在學院內進一步制度化的問題。無疑，台灣哲學界幾十年來已累積豐富的跨文化潛力，而此一歷史文化條件，在國際視野之下，乃是目前台灣哲學界最明顯的特點和優勢。

歐美學界無疑地在西方哲學研究方面具有優勢，然而，跨文化哲學（包含比較哲學及中國哲學）的研究仍處於其邊緣位置。在德國哲學界，許多學者已承認朝向比較哲學或文化間際哲學，以及跨文化哲學的發展是必要的，但目前很難獲

得突破。可以預期的是，在未來十年、二十年內，跨文化哲學（以東亞哲學為焦點）的研究領域將會逐漸形成。

就台灣哲學研究而言，德語學界乃是合適的合作對象，因為台灣哲學界留德的學者不少，亦有在台灣哲學界工作的德籍學者，台德雙方早已產生多面向的互動。這次德國訪問充分顯示，我們應該更積極、更有規劃地相互串聯，以開拓相關的發展潛力。例如在台灣組織一跨校、跨研究單位的跨文化哲學研究群，並且透過共同的研究計畫來推動台灣的跨文化與跨科際研究，以及台、德在跨文化哲學方面的合作。

比較台灣與中國大陸在跨文化哲學方面的處境，乍看之下，中國大陸在這方面的潛力似乎與台灣相似，都是依靠現代漢語作為哲學語言的歷史性條件，然而，兩岸的歷史文化脈絡明顯不同。中國大陸自 1949 年以來徘徊在極端反傳統或盲目肯定傳統之間。目前，哲學界也深受「國學」的影響，因而出現許多要求哲學徹底「去西化」的聲音。在我看來，哲學與大中華文化民族主義的單向連接（意識形態化的連接），或許表面上有助於加強中國古典哲學的學術地位，但對開展漢語哲學之跨文化潛力乃是極為不利的（去西化的方向仍然停滯在中、西的比較框架之中）。反觀台灣，因為複雜的歷史、文化、政治、經濟等因素，更有條件呼應跨文化研究在開放性和多元文化方面的基本要求。

三、展望與建議

一般說來，德國或歐洲的哲學系常常漠視中國哲學，而漢學系對於哲學研究也有所忽略，試圖改變這種隔閡或僵局並不容易。然而，台灣哲學界多少亦有一種自我分裂的傾向，從事西方哲學研究的學者常排斥中國哲學，從事中國哲學研究的學者執著於擺脫西方哲學的影響，然而，跨文化研究需要仰賴兩者之間增益的動態關係，而且在哲學分科專業化成果日益有成的今日，進而推動跨文化研究也是可行且成果可期之事。更重要的是，透過跨國合作的跨文化研究，除了能刺激並提升雙方學界水準，同時也可以在跨國的動態關係中順勢改變各自學界中的僵硬界域，並促使學界重新思考哲學的意義。簡言之，是一種跨國、跨科際、跨文化哲學的三合一策略。

此次參訪除了學術研討與文化交流之外，合作關係之推動也有初步成果，例如希爾德斯海姆大學哲學系與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之合作關係，以及慕尼黑跨科際倫理研究中心與台大生命教育研發育成中心的合作計畫。最後，建議未來繼續朝以下的幾個目標來推展，希望能產生加成的突破：（一）串連具有跨文化哲學意識的哲學研究者，以形成跨文化研究網絡；（二）促進具有長遠發展潛力的國際跨文化研究合作關係（例如台、德合作）；（三）舉辦國際性的跨

文化研習營及研究營；(四) 以跨校合作的方式，設立能夠吸引國際研究生的跨文化哲學課程；(五) 推動相關的翻譯和出版計畫：無論是在台灣或在國外，應該更有系統地推動出版的規劃和贊助。在跨文化哲學方面，首先可以從跨文化哲學的系列叢書開始設想，累積相關著作及工作坊、研討會、研習營等活動的成果。關鍵在於，國外的出版必須奠基於國際合作的基礎上，如此才有實質且長遠的效益；(六) 學術研究之外語能力的紮根：跨文化研究需要紮實的進階學術外語訓練，這不同於一般日常溝通使用的語言基礎訓練，建議以實質的獎勵推動這方面的教學與研討。也可以與翻譯出版計畫相互呼應；(七) 建立台灣跨文化哲學資料庫：蒐集比較哲學及跨文化哲學研究相關的資料，先從書目開始進行，進而建立數位化文獻資料庫等等。